

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郑显亮¹ 谢方威¹ 丁亮² 王雪³

(1.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赣州 341000; 2.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合肥 230022;

3.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汽车机电学院, 赣州 341000)

摘要: 采用问卷法对 81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探讨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1) 客观社会阶层不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 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 (2) 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 网络社会支持调节了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对于高网络社会支持个体, 公正世界信念起部分中介作用; 而对于低网络社会支持个体,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只有直接效应。

关键词: 社会阶层; 网络利他行为; 大学生; 有调节的中介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网络心理和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热点。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研究者不再仅仅重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也开始关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积极作用 (Freis & Gurung, 2013)。网络利他行为即是网络给予人们积极影响的一个集中体现 (Zheng et al., 2018)。网络利他行为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有益于他人而行为者本人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行为, 比如: 在网上祝福他人、在网上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在线上传一些有用的资料等 (郑显亮, 2010)。研究者指出, 由于网络人际关系的匿名性、非面对面的交流等特点会降低人们在情感上的顾虑, 使得人们更愿意展示自己, 更愿意与他人交流, 会主动地为陌生人提供建议或帮助 (蒋雪, 2010); 而网络的共享性又使得网络利他行为的受惠面大为扩大, 人们在網上比现实生活中更乐于帮助别人 (Wallace, 2001)。研究者强调, 网络利他行为对促进人们在网络交往中形成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Nicolas, 2008; Joinson, 2003)。因此, 一些学者呼吁对网络利他行为及其相关问题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 (Wright & Li, 2011; Zheng et al., 2016)。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 研究者在利他者个体心理特征

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与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 (刘勤为等, 2016; 杨欣欣等, 2017; 赵倩, 2018), 但忽略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社会阶层作为影响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变量, 当前也受到了学者的极大关注 (Kraus & Callaghan, 2016)。社会阶层反映了个体拥有的社会物质资源和对自已所处社会地位的感知, 包括主观社会阶层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和客观社会阶层 (objective social class) 两个方面 (Kraus et al., 2012)。研究发现, 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之间具有一致性, 同时又存在差异 (Adler et al., 2000), 主观社会阶层比客观社会阶层有更好的预测效度 (Kraus et al., 2013)。目前大多数研究是综合考察主客观社会阶层, 也有研究分别检验主客观社会阶层的独立效应 (郭永玉等, 2015)。学界对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探讨, 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与高阶层者相比, 低阶层者有较多的亲社会行为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即“拥有少, 付出多”)。社会阶层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强调, 低阶层者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低的社会地位, 对外部的依赖更强, 因此形成了情境主义 (contextualism) 的社会认知倾向, 这就使得他们会更加关注他人的需要, 更愿意与他人交往, 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760286)。

通讯作者: 郑显亮, E-mail: zxl2004@sina.com

(Miller et al., 201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低阶层者有较少的亲社会行为(having less, giving less,即“拥有少,付出少”)。根据成本消耗理论(Cost Consumption Theory),亲社会行为是要消耗或损失一定成本的,个体付出的成本越多,其亲社会行为就越少;相对于高阶层者,低阶层者亲社会行为付出的成本要相对更多,因此低阶层者会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Dovidio et al., 2006; 郭永玉等, 2015)。除这两种观点之外,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它会因为亲社会行为的类型与发生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例如: Kraus 和 Callaghan(2016)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高阶层者在公开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要多于低阶层者,而低阶层者在私下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要多于公开情境。Wilson(2000)指出,对于结果的预期会影响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最近国内有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回报在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在有回报的助人情境中,高低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差异不显著;而在无回报的助人情境中,低阶层者实施了较少的助人行为,他们的助人行为水平比高阶层者更低(芦学璋等, 2014)。网络利他行为作为一种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毫无疑问也会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并且,网络利他情境是一个无回报的助人情境,利他者在网络上的助人行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郑显亮, 2010)。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没有回报,高阶层者在网络环境中要比低阶层者更乐于助人,高阶层者的网络利他行为要多于低阶层者。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否公正的一种信念(周春燕, 郭永玉, 2013a)。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密切。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影响其公正世界信念水平(郭永玉, 周春燕, 2014)。研究者认为,低阶层者占有的各类资源较少,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他们体验到的不公正感会更多,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会更低(Whyte & Han, 2008)。国内学者也指出,低阶层者对不公正现象会更敏感,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感到不公平,而高阶层者对社会公平公正更容易体验(郭永玉等, 2015)。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b)在一项对大学生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正相关均显著,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其公正世界信念得分也越高。而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之一

是赋予个体自信,激发个体为未来目标而努力(Haffer, 2005)。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指出,利他行为的收获首先是互利,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他人是对未来的投资(Blau, 1964)。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相信对他人的帮助将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他们所期望的,而且是他们应得的。可见,公正世界信念会对利他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是个体利他行为的一个保护因子(梁羽, 2015)。研究者指出,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有更积极地自我感知,更具有关心他人的能力(周春燕, 郭永玉, 2013a)。在人际交往中越倾向于遵从互惠的原则,其利他行为也越多(Bègue et al., 2008)。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公正世界信念能有效预测利他行为,即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越坚信世界是公平公正的,越有利于利他行为的产生(姬旺华等, 2014; 李薇等, 201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

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网络社会支持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重要环境助力因子(叶宝娟等, 2018)。网络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网络人际互动中被尊重、支持和理解的程度(Turner et al., 2001)。个体在网络上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很多,比如:在网络中能找到朋友交流共同的兴趣爱好、在网上能获得他人的情感支持、在网上能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料或信息。有研究发现,无论在现实环境还是网络环境,当获得他人的支持时,个体会减少攻击性行为而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Calvete et al., 2010; Scarpa & Haden, 2006)。另外,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人们不仅要交换物质性商品,而且还要交换社会性商品(如爱、服务和信息等)(Blau, 1964)。根据“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理论,利他行为是可以传递的,即“爱心传递”,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获得的帮助或支持越多,那么就会有更强的动机和可能去帮助他人,表现出的利他行为就越多(Nowak & Roch, 2007)。由此我们推断: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较高时,如果个体获得较高的网络社会支持,个体会对他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会加强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反之,当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较低时,但是如果有较多的网络社会支持,由于“爱心传递”,个体也愿意去帮助他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消极影响。可见,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

用可能会受到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 网络社会支持在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 拟考察社会阶层“如何”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以便丰富社会阶层心理学和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科学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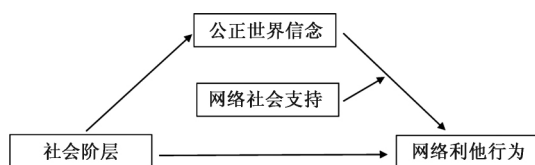


图 1 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江西省随机抽取两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施测,共发放问卷 900 份,回收后剔除漏选过多、随意作答和规律作答等共 87 份,得到有效问卷 813 份,问卷有效率 90.33%。其中男性 265 人(32.60%),女性 548 人(67.40%);年龄在 17~24 岁之间($M = 19.32$, $SD = 1.30$);大一 354 人(43.54%),大二 287 人(35.30%),大三 92 人(11.32%),大四 80 人(9.84%);平均网龄为 7.57 ± 2.52 年,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 4.66 ± 2.68 小时。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采用郑显亮(2010)编制的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该量表共 26 个题目,包含 4 个维度:网络分享、网络支持、网络提醒以及网络指导。量表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网络利他行为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3,四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是 0.82、0.78、0.74、0.76。

2.2.2 客观社会阶层测量

本研究客观社会阶层测量采用了以下五项指标:家庭年收入、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职业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有六个水平:从“5000 元及以下”到“100000 元以上”依次计 1~6 分。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分六个类别: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计 1~6 分。父母职业根据陆学艺(2002)划分的十个社会阶层,分别赋值为 1~10 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地位越高。将收集到的指标进行以下步骤处

理:(1)选取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较高的一方纳入计算,合并为三项指标:家庭年收入、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最高职业社会地位;(2)对这 3 个指标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3)参考任春荣(2010)的研究,将指标的原始分转换成标准分,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综合 SES 指标: $SES = (0.65 \times Z_{\text{家庭年收入}} + 0.78 \times Z_{\text{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 + 0.86 \times Z_{\text{父母最高职业地位}}) / 1.77$ 。SES 得分越高,表明该被试客观社会阶层越高。

2.2.3 主观社会阶层测量

采用 MacArthur 量表(Adler et al., 2000)测量主观社会阶层。该量表是一个 10 级阶梯量表,每一级代表了不同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的人所处的位置。测试时将整个阶梯的图形呈现给被试,让其进行联想,呈现的梯子由低到高共有 10 个等级,代表着社会阶层的高低,1 表示社会阶层最低,10 表示社会阶层最高。让被试判断自己大概处于哪一级阶层,并写上相应的数字。该量表得到了很好地应用,信效度较好(Kraus & Callaghan, 2016; Piff et al., 2010)。

2.2.4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吴胜涛等人(2009)修订的 Dalbert(1999)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共 13 个题目,两个维度: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前者用于评价个体认为世界对自己的公正程度,后者用于评价个体对除自己以外的世界公正的认知程度。量表采用 6 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公正世界信念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是 0.88,两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是 0.79 和 0.78。

2.2.5 网络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梁晓燕(2008)编制的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共 23 个项目,包括 4 个维度:友伴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网络使用中获得的网络支持就越多。该问卷已在国内得到较广泛应用,信效度较好(王伟等, 2017; 杨欣欣等, 2017; 郑显亮, 2013)。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2,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90、0.87、0.75、0.84。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相关研究(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首先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程序控制,如以班级形式

整体施测; 强调问卷的保密性和匿名性; 变换了问卷施测的方式, 如主观社会阶层采用图示法。其次进行了统计控制,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在未旋转时生成了 13 个因子, 58.19% 的方差变异被解释, 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19.65%, 小于 40% 的判断标准, 所以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 1)显示, 客观社会阶层、主观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均显著, 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的相关显著, 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社会支持的相关显著。

表 1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i>M</i>	<i>SD</i>	1	2	3	4	5
1 客观社会阶层	0.00	1.00	1				
2 主观社会阶层	4.41	1.39	0.32**	1			
3 公正世界信念	51.71	8.70	0.07*	0.14**	1		
4 网络社会支持	71.33	13.35	0.08*	0.14**	0.30**	1	
5 网络利他行为	51.66	11.16	0.08*	0.17**	0.17**	0.49**	1

注: * $p < 0.05$; ** $p < 0.01$, 下同。

3.3 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Muller 等人(2005)指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要构建以下 3 个方程:

$$\text{方程 1: } Y = \beta_{10} + \beta_{11}X + \beta_{12}M_o + \beta_{13}XM_o + \varepsilon_1$$

$$\text{方程 2: } M_e = \beta_{20} + \beta_{21}X + \beta_{22}M_o + \beta_{23}XM_o + \varepsilon_2$$

$$\text{方程 3: } Y = \beta_{30} + \beta_{31}X + \beta_{32}M_o + \beta_{33}XM_o + \beta_{34}M_e + \beta_{35}M_eM_o + \varepsilon_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在方程 1 中 β_{11} 显著, 同时 β_{13} 不显著; (2) 在方程 2 和方程 3 中 β_{23} 或 β_{35} 显著, 或者两者都显著; 且 β_{23} 与 β_{34} 同时显著或者 β_{35} 与 β_{21} 同时显著, 即两组 (β_{23} 与 β_{34} , β_{35} 与 β_{21}) 中只需要一组都显著即可。在本研究中, X 、 M_e 、 M_o 和 Y 分别代表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先把性别、年龄和每天上网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然后将预测变量中心化。本研究首先探讨客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在方程 1 中, 客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主效应 (β_{11}) 不显著 ($t = 1.34$, $p > 0.05$), 不满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条件 (1), 说明客观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不构成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关系。接下来再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方程 1 中, 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主效应 (β_{11}) 显著 ($b = 0.96$, $t = 3.75$, $p < 0.01$), “主观社会阶层 \times 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β_{13}) 不显著 ($b = 0.01$, $t = 0.15$, $p > 0.05$), 满足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条件 (1); 在方程 2 和方程 3 中, 主观社会阶层对公正世界信念的主效应 (β_{21}) 显著 ($b = 0.64$, $t = 2.97$, $p < 0.01$), “公正世界信念 \times 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效应 (β_{35}) 显著 ($b = 0.31$, $t = 3.99$, $p < 0.01$), 满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条件 (2)。由此可知, 主观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调节作用产生在中介效应的后半段, 即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受到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

表 2 模型检验

	方程 1 预测变量: 网络利他行为		方程 2 预测变量: 公正世界信念		方程 3 预测变量: 网络利他行为	
	<i>b</i>	<i>t</i>	<i>b</i>	<i>t</i>	<i>b</i>	<i>t</i>
主观社会阶层	0.96	3.75**	0.64	2.97**	0.94	3.71**
网络社会支持	0.38	4.57**	0.25	3.59**	0.43	5.16**
主观社会阶层 \times 网络社会支持	0.01	0.15	-0.01	-0.89	-0.01	-0.73
公正世界信念					0.06	1.43
公正世界信念 \times 网络社会支持					0.31	3.99**
性别	-2.04	-2.54*	2.77	4.10**	-1.99	-2.47*
年龄	0.10	0.36	-0.08	-0.33	0.14	0.49
每天上网时间	-0.04	-0.28	-0.47	-4.33**	-0.01	-0.03
R^2	0.26		0.13		0.27	
<i>F</i>	43.48**		20.26**		35.47**	

为更清晰地显示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将网络社会支持分成两组: 高分组(平均值加 1 个标准差)和低分组(平均值减 1 个标准差), 并进行简

单斜率检验(图 2)。图 2 表明, 在低网络社会支持下, 公正世界信念不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 ($b = -0.08$, $t = -1.53$, $p > 0.05$); 而在高网络社会支持

下,公正世界信念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b = 0.21, t = 3.60, p < 0.01$)。也就是说,网络社会支持调节了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对高网络社会支持个体,公正世界信念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而对网络社会支持较低个体,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则不显著,主观社会阶层直接作用于网络利他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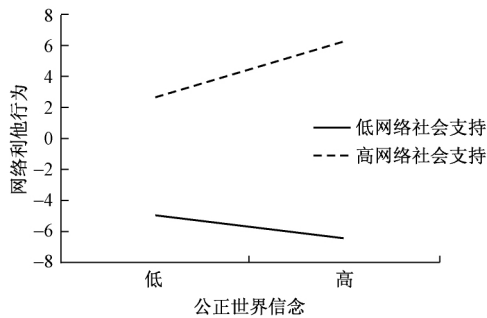


图2 网络社会支持对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利他行为的调节

4 讨论

4.1 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以往研究表明,个体对主观社会阶层的感知与其行为的相关程度更高(解晓娜,李小平,2018),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力比客观社会阶层更强(Kraus et al., 2013; 胡小勇等,2014)。本研究发现,客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对网络利他行为而言,社会阶层的主观指标比客观指标有更好的预测效度。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由于大学生经济不独立,也没有正式工作,因此客观社会阶层主要通过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这三项指标获得。研究者指出,我国的客观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很强,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流动(陆学艺,2004)。而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等反映大学生客观社会阶层的指标容易发生变化。当大学生的客观社会阶层发生变化时,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由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不一定会随之变化,其行为也不一定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他们所处的客观社会阶层并不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良好的预测。

结果显示,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即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其网络利他行为也越多;反之,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低,其网络利他行为也越少。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

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是支持“拥有少,付出少”的观点。主观社会阶层是个体与他人比较时,知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包含了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当个体主观社会阶层高时,内心对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正向评价较高,内心感到知足。内心富足是一种积极的主观体验,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会使得个体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个体处在积极心态时,往往会更乐于帮助他人,产生的利他行为会更多(Joyce et al., 2007; 郑显亮,2013)。该结果也支持了成本消耗理论。和现实利他行为一样,个体从事网络利他行为也是需要付出的,它要在时间、精力或物质上付出一定的代价,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郑显亮,2010)。低主观社会阶层拥有的资源(如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比高主观社会阶层少,因此与高主观社会阶层相比,低主观社会阶层从事网络利他行为所消耗的成本相对来讲就更多。而随着消耗成本的增加,个体从事利他行为就会越来越少(Dovidio et al., 2006)。

4.2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显著,即主观社会阶层会经过公正世界信念这一“桥梁”从而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主观社会阶层越高,其公正世界信念也越高,从而产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也越多。这验证了研究假设2。根据Kraus等人(2012)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者容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归因于社会系统等外部环境,认为世界是不公平的,自己的努力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所以低阶层者的公正世界信念也低;高阶层者常将自己的地位及拥有的丰富资源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相信世界是公平的,自己得到的是通过自己能力和努力应该得到的,所以高阶层者的公正世界信念较高。有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阶层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公正世界信念,社会阶层越高,越倾向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胡月,2015)。而公正世界信念与利他行为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个体越坚信世界是公平公正的,就越愿意帮助他人(Carolia & Sagone, 2014; 梁羽,2015)。另外,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个人资源使得个体有更高的自我感知和自我评价,会促使个体自尊水平的提高(周春燕,郭永玉,2013a),而高自尊个体会更主动地帮助他人,在网络环境中从事利他行为也更多(郑显亮等,2012)。这样,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就充当了“桥梁”的作用。

4.3 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受到了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具体来讲,对于高网络社会支持个体,公正世界信念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而对于网络社会支持较低个体,公正世界信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与“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一致,该假说认为一种保护因子可能增强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鲍振宙等,2013)。在本研究中,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社会支持均为网络利他行为的保护因子,这两种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时产生了交互作用,网络社会支持有效地促进了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其原因可能是,网络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因素,它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压力等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会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认知和积极情感(郑显亮,2013)。网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的情绪会更加积极,看待事物会更加乐观,这样就更容易在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下,相信好人会有好报,使得个体对网络环境的态度更为积极,就更易在网络环境中实施利他行为。另外,根据利他行为的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遵循公平原则,会对付出与获得的分配比例做出判断,希望自己的付出会有恰当的收获,而不想做“赔本”的交换(Molm & Cook, 1995)。网络社会支持越低,个体在网络上获得的帮助就越少,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原则,个体在网上主动去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也就会越少,这样就消弱了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

4.4 研究的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启示性。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表明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是支持“拥有少,付出少”的观点。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丰富了社会阶层心理学和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难以得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采用实验法或追踪研究的方法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其次,本研究的被试只来自于一个地方的两所高校,取样的范围太窄,样本的代表性不够高,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样本仍有待检验。最后,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只考察了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探讨其他变量(如共情、人际信任等)在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5 结论

(1) 客观社会阶层不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2) 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3)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受到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对于高网络社会支持个体,公正世界信念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对于低网络社会支持个体,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观社会阶层对网络利他行为只有直接作用。

参考文献: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 Bègue, L., Charoillaux, M., Cochet, J., Cury, C., & de Suremain, R. (2008).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the bidimensional just world belie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1*, 47–56.
- Blau, P.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Calvete, E., Orue, I., & Padilla, P. (2010).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Modalities and aggressors' profi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5), 1128–1135.
- Carolia, M. E. D., & Sagone, E. (2014).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in adolescence.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16*, 596–600.
- Dalbert, C. (199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2), 79–98.
-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Schroeder, D. A., & Penner, L. (200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social behavior*. Mahwah, NJ: Erlbaum.
- Freis, S., & Gureng, R. (2013). A facebook analysis of helping behavior in online bullying.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2*(1), 11–19.
- Hafer, C. L. (2005).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just-world theory: Problem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1), 128–167.
- Harrison, D. A., McLaughlin, M. E., & Coalter, T. M. (1996). Context, cognition, and common method variance: Psychometric and verbal protocol evide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8*(3), 246–261.
- Joinson, A. N. (2003).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et behavior: Virtual worlds, real live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oyce, F., Joanna. P., & Nicola, R. (2007). Children's altruistic behavior in the dictator gam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 168–175.
- Kraus, M.,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69–777.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 Kraus, M. W., Tan, J. J.,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81–96.
- Miller, J., Kahle, S., & Hastings, P. (2015). Roots and benefits of costly giving: Children who are more altruistic have greater autonomic flexibility and less family weal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7), 1038–1045.
- Molm, L. D., & Cook, K. S. (1995). *Social exchange and exchange networks*. Boston: Allyn & Bacon.
- Muller, D., Judd, C. M., & Yzerbyt, V. Y. (2005). When moderation is mediated and mediation is modera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852–863.
- Nicolas, G. (2008). Helping on the web: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 1–3.
- Nowak, M. A., & Roch, S. (2007). Upstream reciproc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gratitud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4(10), 605–610.
- Scarpa, A., & Haden, S. C. (2006). Community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Aggressive Behavior*, 32(5), 502–515.
- Turner, J. W., Grube, A., & Meyers, J. (2001). Developing an optimal match within online communities: An exploration of CMC support communities and tradi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Community*, 55(6), 231–251.
- Wallace, P. M. (2001).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9–223.
- Whyte, M. K., & Han, C.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1), 29–51.
- Wilson, J.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215–240.
- Wright, M. F., & Li, Y. (2011).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young adults' face-to-face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their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5), 1959–1962.
- Zheng, X., Wang, Y., & Xu, L. (2016).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or.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4(9), 1575–1583.
- Zheng, X., Xie, F., & Ding, L. (2018).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ord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u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 e1–7.
- 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艳辉. (2013). 校园氛围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1), 61–70.
-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 郭永玉, 周春燕. (2014). 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1), 63–67.
- 姬旺华, 张兰鸽, 寇戡. (2014). 公正世界信念对大学生助人意愿的影响: 责任归因和帮助代价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5), 496–503.
-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郭永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37(6), 1509–1517.
- 胡月. (2015). 主观阶层对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及其心理机制(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蒋雪. (2010).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长春.
- 李薇, 陈晓梅, 金晓君, 赵妍, 李丽娜. (2014).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利他行为的相关性.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2(6), 946–948.
- 梁晓燕. (2008). 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梁羽. (2015).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利他行为关系的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和感戴的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河南大学, 开封.
- 刘勤为, 徐庆春, 刘华山, 刘勤学. (2016).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4), 426–434.
- 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2014). 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 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37(5), 1212–1219.
- 陆学艺. (2004). *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5), 77–82.
- 王伟, 王兴超, 雷雳, 付晓洁. (2017). 移动社交媒介使用行为对青少年友谊质量的影响: 网络自我表露和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40(4), 1671–1691.
- 解晓娜, 李小平. (2018). 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6(4), 563–569.
- 杨欣欣, 刘勤学, 周宗奎. (2017).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2), 183–190.
- 叶宝娟, 杨雪, 雷希, 郑清. (2018). 网络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网络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208–1214.
- 赵倩. (2018). 大学生道德认同与网络利他行为: 网络道德与性别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226–1229.
- 郑显亮. (2010).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量表制作与多层线性分析(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 郑显亮. (2013). 现实利他行为与网络利他行为: 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1), 31–37.
- 郑显亮, 张婷, 袁浅香. (2012). 自尊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通情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4), 550–551.
-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a).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 *心理科学进展*, 21(1), 144–154.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b).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Social Clas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ZHENG Xianliang¹ XIE Fangwei¹ DING Liang² WANG Xue³

(1. Educational Science School,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2. The Forth People's Hospital of Hefei, Hefei 230022; 3. Automotive Mechatronics School, Jiangxi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Ganzhou 341000)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a sample of 813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clas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IAB).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IAB, while objective social class could not; (2)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IAB;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as moderated by online social support. That is to say,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IAB for the individuals of high online social support; However, for the individuals of low online social suppor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only had direct effect on IAB.

Key words: social clas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